

戈的解析

◎崔斌

戈，是什么？

戈形似现在的镰刀，由戈头和柄组成。关于戈的起源，一般认为是由新石器时代的石镰演化而来的。

首先，戈是兵器。

戈是盛行于商代至战国时期的一种格斗兵器，可横击，又可勾杀，后因作战需要和使用方式不同，分为长、中、短戈三种，长戈用于战车，短戈用于步兵。戈可以用于横击、钩杀和啄击。戈的刃部叫援，尖端称锋，转折而下的部位叫胡，纳秘的部位叫内，援和内的连接处叫阑。援末胡上的孔叫穿，用于系绳。戈可以通过搭配不同长度的戈秘，来灵活地适用于战车或者步战的战争环境。

战国时期的齐国经济发达，战争频繁，戈是常见兵器之一。青州博物馆收藏的战国“陈胎之右户戈”铭文铜戈，保存完好。有趣的是，这件铜戈是1975年从青州五里废品站拣选到的。直援，无脊，短胡，饰有四个长孔穿，阑较高，内后部略呈弧状。可贵的是在援部和胡部阴刻一直行铭文：陈胎之右户戈，点明这是陈胎这辆战车上右侧的战士姓户的人所配备的铜戈。

另一件铜戈为战国“工城佐逆昌卯戈”铭文铜戈，直援，无脊，存三穿，胡部从第三穿处残缺，阑较高，内后部呈弧状，其上有铭文二行七字，应为“工城佐逆昌卯戈”。“工城”即攻城，此戈即攻城时立于车左侧的兵士逆昌卯所用之戈。由此可见，攻打重要的城池，都需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。何人用何兵器，立于何位置都事先布置明确，也是为了不误战机，确保攻城胜利。

广州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秦“十四年属邦”铭文铜戈，援、胡均带有锋刃，锐利依旧，刃部几处小豁口记录了其赫赫战绩。内一侧刻有十二字铭文，表明这件铜戈为秦始皇十四年（公元前233年）由工官监造的兵器。秦对兵器制造实行监、主、造三级负责制，史书上称“物勒工名”“物勒工名”，指器物的相关方刻名，以便质量检验和日后追查。

1982年，河南郸城县宁平公社一社员在宁平西二华里挖水沟时，发现青铜戈一件。戈刃锋利，援和胡上刻有铭文，共十五个字。根据戈的形制体例和内中的“邦”字，定为战国时期“邦国”遗物。专家认为：“邦”是国名或地名，即山东琅邪。秦灭楚后，挥兵攻齐，可能秦、齐在郸城一带发生战斗，齐国兵卒战死后，连同兵器被埋于墓中。这铜戈，见证了战国晚期的一场战争，迅速崛起的秦国在兼并中和列国兵戎相见。

这些精心的备战，精确的算计、强兵的举措，是打赢战争的基础，呈现了诸侯争霸的殚精竭虑的准备。而戈的样式也在时光交替中不断演变，和战事息息相关。

从4000多年前二里头时期最早的青铜戈问世，一直到商代早期，出土的青铜戈都是“无胡戈”。由于缺少胡部锋刃，锋刃与戈柄之间多为直角，不能进行有力地钩杀动作，只限于啄击和推击。商代，战车出现在战场上。战车滚滚向前，将士们变幻着阵型，左冲右突，戈因其长度略长于矛戟，刀剑而更适合战车对抗。驾车人挥舞着短剑防护，车上站的士兵们靠盾牌遮挡，挥舞青铜戈啄击和推击敌人。商代晚期出现了条形短胡戈，戈头狭长，有胡，阑也比较长。到了春秋时期，戈的形式越来越多，更富有杀伤性。战国中晚期，青铜戈的内部开始开刃，戈头变得长而狭，并在戈头中部束腰，更利于钩割。战国晚期，铁戟开始淘汰青铜戟，并列装军队，铜戈也在战场上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其二，铜戈也是礼器。

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兵器，名为“邶王是桢(野)戈”。这件青铜戈舌形短援，援末下垂成胡。胡后有扁圆形脊，上有一穿，内呈镂空的鸟兽状，为一条宽体飞龙，后爪抓着自己的翅膀，后臀下是一只衔着虺蛇的雁，造型独特，镂空纹饰精美。援的两面铸有八字铭文：“邶王是桢(野) 作为元用”。这铭文的意思是说，邶王“是桢(野)”做了这件顶级的兵器，供自己使用。

湖北省博物馆珍藏的春秋晚期的曾侯昞铜戈，其援较长且带有脊棱，阑的一侧精心设计了两个长方形和一个半圆形的穿孔，用作捆绑固定手柄，再看铜戈的内部，上面同样设有两个穿孔，这些穿孔增添了整体的精致感。而内上的装饰更是精妙绝伦，错金云纹如同天上缥缈的云彩，华丽而又神秘。最引人注目的，当属援部和胡部那错金的鸟篆铭文“曾侯昞之用戈”，据考证，这件铜戈的主人曾侯昞是春秋晚期曾国的国君。

一件青铜器物如此美，让人暂时忘却了它还是一件冷血的兵器，看看就好，怎舍得轻易使用？

其三，铜戈也可能是纪念物。

2002年，文物部门对枣庄市山亭区东江村的一个古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，这次发掘揭开了春秋古国小邾国的神秘面纱。出土文物中，有一件“倪公戈”十分引人注目，上面刻有十二个字的铭文，专家破译为“倪公克父，择其吉金，作其元用”。大概意思是：这把战戈为倪公克父专用，他选择了最好的金属锻造而成，希望此后能一代一代相延下去。

其四，铜戈也是明器。

广州“螺岗”秦墓出土了铜戈，从当时墓葬发掘时所绘的平面图中看，铜戈位于陶瓮、陶罐的旁边，斜置，锋向下，秘朽无痕。墓中仅此一件兵器，其他均为壶、盒、釜、盘、带钩等生活用具，应该都是墓主人身前的所用物品。西周时期关中地区的男性墓葬中常见随葬戈、盾的现象，且戈经常被人人为地砸弯和折断，这就是“毁兵”葬俗。损坏兵器再用于陪葬，还可以消除兵器被挖掘再利用的隐患。

《淮南子》中讲了个故事：从前，夏部落的首领鲧建造了八尺高的城池来保护自己，大家都想离开他，别的部落对夏虎视眈眈。后来，禹当了首领，拆毁了城墙，填平了护城河，把财产分给大家，毁掉了兵器，用道德来教化人民。于是大家都各尽其职，别的部落也愿意归附了。禹在涂山开首领大会时，各地首领纷纷进献玉帛珍宝。

干为防具，戈为武器，古人以“干戈”通称兵器。这故事就是“化干戈为玉帛”的由来。还有人对武字进行拆字，提出止戈的解析，或许，武的最高境界就是停止兵事吧。



△战国“陈胎之右户戈”铭文铜戈。(资料图片)

我所经历的淮海战役支前

◎冷兆亭/口述

邱昭山/整理

我叫冷兆亭，生于1930年，高密东北乡王家丘人，有三个兄弟。我们村北靠胶莱河，新中国成立前属胶东解放区平度县(1945年自平度县析置，1953年撤销)运河区。

民夫和小车组成一个分队

1948年农历八月份，在区上和村干部的动员下，我们村出了三辆独轮手推车，木轱辘，中间有个车脊梁，小车两边一边放一个口袋，一个口袋里盛100斤小米，每辆小车配两个民夫，一个在前拉车，一个在后推车；附近三个村子，杨家丘也出了三辆，朱家三辆，谭家两辆。我们先到麻兰(平度县政府驻地)集结，开了四五天会，先学习动员，提高觉悟，再进行编队。运河区出了100多辆小车，200多号人，区长辛进胜(音)带队。王家丘、杨家丘、朱家、谭家四个村子出的11辆小车和22个人，组成一个小车分队，由刘家西埠(属平度)的刘正年当分队长。

那时候支前，除了像我们小车队这样运粮食的，还有挑挑子的、抬担架的。

把粮食送到前线

从胶莱河北的麻兰，经过张戈庄(属平度)，我们一辆小车推着200斤小米，一路南下，经过高密、诸城等地，到了沂水。沂水是革命老区，我们平度县的小车队都到沂水马站集结。马站是个大村，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些日子，就南下，跟着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走。

在淮海战役的第二和第三阶段，我们平度县的小车队继续跟着第七纵队征战，在江苏、安徽、河南交界的丰县、沛县、萧县、砀山县、永城县之间转悠来转悠去。我记得淮海战役打了两个多月(淮海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)。在淮海战役打得激烈的时候，我们的小车分队总共向前线运送了四趟粮食。白天有敌人的飞机轰炸，不敢走，就夜里走，到前线一个来回，要走约80里路。我们两个出工的，一个拉车，一个推车，过会儿再换过来，黑灯瞎火的，赶紧慢跑，总算完成了任务。

在前线运粮食，常常碰到双方炮

击，炮弹不一定落到哪里，有时还遇到敌人的飞机轰炸。刘正年嘱咐我们，遇到危险，要跑开，“撂(扔)了小车，也别撂(扔)了口袋”。口袋里有粮食，保住了口袋，就保住了支前的粮食。

那时，我们小车队还带着木匠。小车是用槐木做的，木轱辘容易坏，如果坏了木匠就马上拾掇，也有确实拾掇不好的时候。

支前民夫的生活

我们从平度县走的时候，一辆小车上推了200斤小米，走到淮海前线得走几个月。支前的路上，隔一定距离，地方政府就在一个村子设一个饭站，我们民夫到了这里，就由饭站供应粮食。可以说，到了哪里，就在哪里吃饭，小车上的粮食，我们民夫不动。我记得到了沂蒙山区，就吃妇女烙的煎饼。当地妇女一起烙煎饼，今天你帮我，明天我帮你。把饼烙熟了，就在铁条上晾，晾干了，就拿下来，放到炕席上搁着，一屋一屋的。烙煎饼，用的是地瓜干，小米磨成的面，没有白面的。

我们还吃小米干饭，谷面饼子，还吃过高粱面饼子。解放军呢，都背着一袋干粮袋，里面盛着用小米面做的炒面，他们也吃小米干饭。那时候挺艰苦，小麦产量也低，他们偶尔能吃上顿白面馒头，就很不错了。

我们小车队从平度县走的时候，天气还有些热，我带了一床被褥子，带了一件大褂子改的大袄，袄里面絮了一些棉花，挺薄，没有带棉裤和棉鞋。冬天到了，就把两条单裤子套起来穿。

我记得我们跟在部队后面，来到河南永城。我们那个小车分队住进一个建在土台上的村子，在一间草坯屋里支下行军锅，煮起小米饭。突然，一发炮弹从村子上空打过去，一大块泥坯从屋顶上掉下来，正好掉到行军锅里，把滚烫的水和米炸(溅)出来了，把当炊事员的谭清和(音)的脸和胳膊烫伤了。

跟着南下的解放军，我们小车队到了淮河沿上。那里刚解放，老百姓对解放军和我们这些支前的队伍还没有认识，有的住户不欢迎我们住宿。有一次，我记得我们那个小车分队赶了一天



△淮海战役纪念馆中的独轮车。(资料图片)

支前途中遇险

我们小车队要进邳城的时候，遇上了敌人的小飞机。小飞机朝下略微一扎头，就向下扫射，打中了几个挑夫，我扔了车子就地卧倒。飞机把头拉上去了，我爬起来，赶紧向城门跑，刚跑进城门洞子，小飞机又赶着朝下扫射，幸亏有城门洞子罩着，不然我就“挂彩”了。

邳城旁边有一个大集镇，叫口子集(音)。那天，正逢口子集赶大集。看到小飞机飞走了，觉着没事了，我和来自谭家的民夫谭川洋(音)，商议着到集上买俩煎饼包解解馋。那时候，民夫一个月发5分钱的北海票，当补助金，几个月了，我们攒下了一点，就一块到了口子集。看着煎得焦黄的炉包，口水都流了下来，我们掏出身上带的北海票。因为



△支前的架子车队。(资料图片)

路，太阳快落山了，来到一户前后是砖房的人家，想晚上住在这户人家的南屋里，让他们把屋里的东西倒腾出去一些，但人家不让住。刘正年去动员，称对方“同志”，反复做工作。出来应对的是这户的一个青年妇女，她说：“不行！你得叫‘姑姑’！”新区的很多老百姓还不认“同志”这个称呼。刘正年称了她“姑姑”，我们这个小车分队才住了下来。

那里解放不久，我们刚开始还以为卖炉包的不要北海票，没想到人家要，就一人买了两个炉包。刚把用纸包了的炉包拿到手里，就听到敌人的轰炸机“轰隆轰隆”飞来了，总共两架，都飞得很低。当时，咱们的部队正从南门向城里开进。一看不好，我喊了一声：“快走吧！”就和谭川洋迈开大步，一口气跑出去半里多地，比兔子还快，跑到一个叫李家店的村子才停下。在我们跑的时候，敌机向下扔了炸弹，扔了两次，每次扔下七八颗，把集上的东西都炸了。听说，炸死炸伤很多人，把若干房子炸倒了，街炸平了。那两个炉包，我和老谭都揣在前怀里。等敌机飞得没影了，我们才一屁股坐到地上，三两口，就把炉包吃了。

完成支前任务

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，我们准备回山东。这时候对民夫进行评功，我被华东支前委员会评为三等功。这年3月，我们小车队回到了平度县。

支前六个月，王家丘、杨家丘、朱家、谭家四个村派出的十一辆小车，回来时只剩四辆了。另外那些小车，有的是推拉车子的民夫病了，有的是小车坏了，修也修不好，有的则是调到了别的小车分队。

难忘在抗属大队的日子

◎庄锦华/口述

齐英华/整理

就砸冰块吃，咸菜吃光就炒盐粒吃。

抗战胜利后，斗争形势依然紧张，抗属大队的名称继续沿用。1946年春，我和母亲跟随抗属大队，从大泊子村来到东横沟村，父亲时任中共寿光县委城工部部长，后兼任武工队政委，我们在东横沟村小学读二年级，是一名儿童团员。

年少时，我曾两次见到解放军，一次是1946年4月22日，大爷爷庄鹤云(后改名庄立安)和我父亲，用自行车分别载着我和母亲到淮南独立营驻地，打算用独轮车将我母亲和5岁的我送到抗日根据地——淮北固堤场村(今属滨海区央子街道)，成为抗属大队的成员。直至潍县解放，我在抗属大队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岁月。

到达潍北后，母亲放了裹脚布，参加了识字班、妇救会，我开始上小学。一年多的时间，根据地经常遭到日军扫荡，我们的住处需要时常转移。鬼子来了，我们就躲到野坡地窖里，喝不上水

团团长庄中一一行十余人，从昌邑返回惠民途经东横沟村，他们骑着军马，庄中一腰佩手枪，警卫班穿着军装，带着匣子枪。

从1946年夏至1947年夏，我们母子三人跟随抗属大队，辗转淮北、寿北、昌北的渤海盐滩水洼地一带，曾两次经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解放区。

1946年七八月间，在国民党军攻打固堤时，我在东横沟村还能听到炮声和机关枪声，我们从东横沟撤回到大泊子村。1947年春，一支20人的武工队驻在大泊子村，队长王伦岗、副队长张启兴，我父亲兼职政委。我和母亲与武工队住在一起，母亲帮他们烧水做饭，缝缝补补。6月，国民党军开始向潍北解放区进攻，父亲的警卫员用木船沿白浪河送我们母子三人(妹妹“玉雪”于5月13日出生)撤离到固堤场村，在白浪河大湾口村北段，我看到漂流着被还乡团杀害的我县大队战士和村干部的人头。两年间，千余潍北人民被

残害。

1947年夏天，抗属大队向西撤退到丰台岭、韩家庙子，准备过弥河转移到渤海区根据地，正遇弥河发大水过不去，来接我们的警卫员也过不了河。我们只好再向东撤退到昌北瓦城住了一夜，准备往胶东根据地转移。第二天拂晓，国民党军的炮声从瓦城以东传过来，这是要攻打瓦城了。在敌人的大炮、机关枪声中，抗属大队来不及吃早饭，紧急从瓦城向西北方向转移。经过虞河水洼地时，水洼地一米多深，都没到我的脖子了，母亲怀抱着妹妹，手拉着我，满脸汗水，艰难急促地行走，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头上不时飞过流弹，我们娘仨险些丧命。过了三条河，经过烽台、东利渔、西利渔，行程50多里，傍晚时分才到达固堤场村。

我们经历了艰苦岁月，终于盼到潍县解放，1948年5月，我回到庄家村，一年后迎来新中国的成立。